



HONGSE JINGDIAN DE
WENXUE JIAZHI ★

“红色经典”的 文学价值

阎浩岗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I207.42
Y088

HONGSE JINGDIAN DE
WENXUE JIAZHI ★

-98

“红色经典”的 文学价值

阎浩岗 著

I207.42

Y088

人 民 大 学 社

策划编辑:孙兴民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宋春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阎浩岗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
ISBN 978-7-01-008073-4

I. 红… II. 阎… III. ①小说-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②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3908 号

“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

HONGSE JINGDIAN DE WENXUE JIAZHI

阎浩岗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永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9.375

字数:21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8073-4 定价:2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可能性

——代序

程光炜

十七年文学研究如果从 1999 年算起,迄今已走过了十个年头。它之所以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想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 90 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加快和深入剧烈,中国的社会意识和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需要对“历史”做进一步的重评。二是由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内部调整的需要。80 年代中期前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潮通过将“左翼文学”边缘化确立了“纯文学”的秩序,但是这种简单化的、二元对立式的理解历史的方式,后来逐渐显示了它思想单薄、学术平板的一面,于是对它的质疑,以及提出清理这种研究结论的呼声在学科内部日益呈现。我想阎浩岗教授的《“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从酝酿到写作的过程,应该都在这一学术思潮的背景之中。

我与浩岗教授结识于几年前,后来到他供职的大学文学院讲学和答辩,便比较熟悉了。在这种情况下得知,他为十七年文学研究投入了大量心力和劳动,而且此前,已有相当可观的学术成果问世。我们知道,出现于十七年的“红色经典”是在这些作品被充分“当代化”的情况下展现在读者面前的,由于社会思潮对它们的合法性予以了先验性的强大支持,它们成为“文学史经典”几乎没有成为什么问题。但是,由于 80 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干预,它

们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出现了全面危机。因此,如果从“重写文学史”思潮的终结点上重新研究它,就必须使用理性的评价眼光、“历史化”的态度,探讨如何重新“入史”的方法和可能性。在本书绪论中,浩岗教授对之做了长篇大论的界定、分析和讨论。这些讨论,应当能给读者留下较深的印象。

这本著作各章以大家熟知的“经典小说”为支撑点,通过具体文本和材料的重新释放与分析,试图把它们与“革命”、“出版史”、“阅读史”加以纵横交错地联系,在历史的细微处,探寻当时文学批评未曾注意,但是对于今天却非常重要的资源信息。通过这些信息,与今天的当代文学史研究对话,并在这种对话成为某种可能的前提下,将十七年文学置于一个适当的历史位置上,最终找到它真正的社会学价值,文学性的缺失,生产、阅读与传播过程中值得记取的教训,等等。这本著作给我印象最深的,恐怕是作者平实而具史观,对材料的捡拾、筛选、淘汰、处理过程中那种谨慎和有分寸的治学态度。当然,有启发性的历史分析,也需要一定的尖锐度,甚至牺牲观点的某种圆润性而发散出的强烈的思想征服信息。但是,这种尖锐度并不是随处都能出现的,毫无节制地暴露给读者的,如果是那样,风格的粗糙和姿态的轻浮也终于难免。

然而,十七年文学研究一定要在“文学与政治”的轨道上不加怀疑地继续运行么?对此我感到不安。十七年文学研究是在清理、反思“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基础上出现的,但是,它是不是也无意在吸收被反思对象身上固有的东西,如纯文学趣味、加害心理、争取独立的倾向,等等。这些,最近几年已在不少研究成果中被复制,它们对进一步研究的控制和影响,是应该引起必要的警惕的。但本书作者就在十七年文学的历史策源地供职,长久地生活在那方血气方刚的土地,体验和观察那些历史遗址中还未被知识化模

式化的丰富信息,我想浩岗教授当会产生更为独特和具有深度感的历史选择意识。尤其是有些研究模式的时尚性开始减弱,而我们通过自我反省而产生的寻找新的研究可能性的要求自渐成形的時候,那么更有价值的研究也许就已经开始。我希望用这些话与作者共勉。

2009年6月26日于北京

写在前面

本书所谓“红色经典”，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间那批发行量巨大、社会影响广泛深远的长篇小说。对“红色经典”的称谓有些专家不以为然。本书沿用此称，并非意味着事先确定了研究对象的永久“经典”地位，而是因它近年已约定俗成，所指明确，使用方便：“红色”是指政治倾向，“经典”是指其影响巨大以及对一个时代文学面貌的代表性。换句话说，笔者事先确定的只是：它们可看做一个特定时代的“经典”。这些作品究竟能否成为留传后代的文学名著、在文学史上会占据怎样的地位，这正是本书要专门探讨的。

对“红色经典”进行思想文化角度的研究，比如探究它的生产机制、它与“启蒙”及“现代性”的关系等等，近年学界已有丰硕成果。但现有成果描述性研究居多、评价性研究较少，评价性研究中从“启蒙”或“现代性”角度切入的居多、从文学本身角度切入的较少。笔者推测，这或是因有的研究者本来就认为这些作品没什么文学价值，或是因做评价性研究、从文学本身角度切入操作起来比较困难。比如，所谓“文学价值”的具体内涵究竟是什么，学者们恐怕就有不同理解。题目难做也得做，因为这些长篇小说毕竟首先是“文学”作品，对后世它们是否还会产生影响，关键取决于其本身的文学价值而非其他。笔者认为，了解文本的生产机制及其素材背景对理解作品的内涵及其艺术成就会有帮助，但将作品置

于文学史长河中评估其价值与地位,有时恰恰需要排除对其产生背景及生产机制、意识形态因素的考虑,尝试以对“历史”不甚了了的后世读者的眼光来看它们,就像今天没读过陈寿《三国志》及一切相关史料的读者读《三国演义》那样。钟嵘《诗品》品评前人诗作并确定其品位等级,后世看来虽未必准确,但大家一般还是认为这种品评值得去做。愚以为,描述性研究还是不能取代评价性研究。

先讲明题目之难,意思其实就是给自己可能会出现疏漏谬误找个理由,祈求读者和专家们的谅解;又说这题目必须做,则意在点明本书乃引玉之砖,呼吁同行们也来做,并做出更坚实的成绩。

目 录

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可能性——代序	程光炜(1)
写在前面	(1)
绪 论	(1)
一、“文学价值”的评判标准	(1)
二、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化”态度	(9)
三、文学史的“入史”资格	(11)
四、文学史写作的体例	(15)
第一章 从文学角度看“红色经典”	(21)
一、文学价值本身的角度与“红色经典”的 “文学史化”	(22)
二、为“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一辩	(29)
三、“红色经典”文学价值的体现及其分档	(42)
第二章 “土改”叙事:在“十七年”的入口处	(53)
一、《暴风骤雨》第一部:快意的除霸复仇	(56)
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揪出伪饰的恶霸	(60)
三、《暴风骤雨》第二部与“土改”叙事中的道义问题	(67)
第三章 《红旗谱》:日常化的革命叙事	(73)
一、人物形象的日常性	(75)
二、人物关系与叙事逻辑的日常性	(81)

三、“闲笔”的魅力	(85)
四、日常生活描写的题外之旨	(98)
第四章 《创业史》及其他合作化题材长篇	(107)
一、艺术描写的真实感与人物形象的生动性	(109)
二、人伦挚情与创业激情:艺术感染力的源泉	(114)
三、善良与尊严:永恒的道德价值	(119)
四、《山乡巨变》:另一种真实和别样的魅力	(130)
五、《三里湾》与《艳阳天》:乡村道德冲突的写实与 权力斗争的传奇	(138)
第五章 通俗传奇与英雄史诗	(153)
一、《林海雪原》、《三家巷》及其他“革命通俗小说”	(154)
二、《保卫延安》、《红日》与当代小说的史诗性追求	(164)
三、《李自成》:规模空前的英雄史诗	(169)
四、《苦菜花》:政治规约下的人性表现	(177)
第六章 《青春之歌》:自叙传与“集体创作”	(183)
一、作家创作主旨与读者期待视野	(183)
二、作家创作心态及作品修改得失	(188)
三、自我实现者的心路历程与青春激情的颂歌	(194)
第七章 《红岩》:纪实与传奇结合的奇书	(201)
一、史实与虚构的艺术化处理	(202)
二、空前绝后的意志传奇	(209)
三、从真实感看其艺术得失	(214)
四、超越意识形态的精神价值	(223)
第八章 文学史长河中的“红色经典”	(227)
一、“红色经典”与毛泽东文艺思想	(227)
二、农、兵的生活及其思想感情	(232)

三、理想化人物与乐观明朗基调	(237)
四、“红色经典”对“长篇小说美学”的探索	(246)
五、“红色经典”与新时期小说	(252)
结 语	(261)
参考文献	(265)
附 录 本书所论主要作品初版日期、主要版本及被 改编情况	(271)
后 记	(280)

绪 论

学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从思想史与文化角度进行的研究,开阔了文学研究的视野,取得了不菲的实绩。但正如单从政治革命角度阐释文学会产生“偏离角”一样,单从思想史或文化角度进行的这种研究也导致了新的“偏离角”。笔者以为,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应更突出“文学”的特性,而对时间和心理距离都离我们比较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叙述,应注意采取更“历史化”的态度。与上述问题密切相关的,是作家作品的“入史”标准以及文学史著作的体例问题。新时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为写出更完美的文学史著作进行了不懈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给笔者许多启发。笔者非常尊重并感谢各位前辈、同辈乃至晚辈的现有成果,但也有自己的思考,认为有些问题尚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一、“文学价值”的评判标准

不论是否明言,作品“真实”与否一直是人们评判其文学价值的重要标准之一。新历史主义理论宣告了还原和重述原初历史真实的不可能。文学文本更是有意的虚构,文学世界是一种虚拟时空、想象时空,文学作品与历史真实靠近的程度不应是评判其文学价值的标准。但是,由于中国古代曾经的文史同体,以及后来

“诗”与“史”的纠缠,事实上以“史”量“文”的现象非常普遍。当然,理论家们也意识到了文学与历史的差异,于是提出“艺术真实”、“本质真实”的概念,以图找到“真实性”与“艺术性”或“文学性”之间的连接点,但“艺术真实”、“本质真实”涵义有些模糊,有些似是而非。对“真实”的认识具有主观性,可使用“艺术真实”、“本质真实”概念的人又将其看作客观事实、看作作品的客观属性,操作起来就难免言人人殊却又都认为异于己说者错误,难以取得共识;由于不同时期、不同批评者对社会“本质”的理解不同,其“所指”就不断“滑动”。即使是细节真实、生活真实或历史真实,由于每一主体各自独特的经验与观念,也会有不同认识和理解;即便是历史“亲历者”的叙述,每个人的“亲历”不尽相同,其历史叙述也不会完全一致。拿《创业史》和《山乡巨变》来说,前者突出了农民互助合作要求的自发性,表现出合作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后者则叙述了合作化自上而下的发生发展过程。究竟哪一个更合乎“历史真实”?柳青和周立波都曾深入生活,其作品都不是向壁虚构的产物,我们不能在判定其中一个“真实”时就断定另一个“虚假”,因为他们分别“深入”的是关中平原和湖南益阳农村的生活。在这些作品初次发表或出版的当时,评论者也无法拿出实证的材料说明其真或假。我以为,以“真实感”取代“真实性”,更合乎文学活动的实际。当我们评论文学作品的“真实性”时,评论的其实是其“真实感”,就是说,它们是否让我们感到真实;而我们的感觉,凭的是每个接受主体掌握的事理逻辑。符合的,就认为“合情合理”,认为其“真实”,不合的,就认为虚假。人类对事理逻辑的理解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一面,又有因时空而产生差异的一面。一般来讲,同一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读者,其对事理逻辑的理解是基本相同或比较接近的,这样就有关于“真”与“假”的一些共

识,而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读者因经验与观念有异,对事理逻辑的理解会有或多或少的差异。例如,印第安人信以为真的事,我们可能感觉荒诞不经;“十七年”和“文革”时期人们认为自然而然的事,现在的人会感到荒唐可笑。时空的隔膜使“真”变为“假”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相反的情况,就是时空差异反而使“假”成为“真”,例如我们看《三国演义》以及维克多·雨果的作品,对其中情节的离奇、人物的神奇一般不会苛责,觉得过去的人、外国人也也许就是这样,而对以当下身边现实为题材的作品,对其任何失真之处都特别敏感。

已有不少人指出《三国演义》与史实乖舛之处,但这并不影响其文学价值。比较而言,与史实更靠近的《东周列国志》,文学价值却远逊于《三国演义》。近年又有人发表文章指出《红岩》的史实错误,但那也与其文学价值没有直接关系:只要阅读《三国演义》或《红岩》时读者不感到虚假,能够接受,它就具有了“真实感”;多年之后时过境迁,它还能给人以真实感,那它就具备了文学价值的起码因素。得出这一结论,意味着将文学作品是否“真实”的评价权力,从批评家那里分散出一部分甚至一大部分给了普通读者。

如果说“真实感”是作品文学价值的必要条件、基本条件,那么“艺术感染力”就是作品文学价值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具有一定艺术感染力的作品,也就具备了一定的文学价值。在同样具备艺术感染力的前提下,有时作品的文学价值高下确实取决于其思想深度。但是,不论是抒情文学、叙事文学还是戏剧文学,都首先应诉诸读者的感性,给其以情绪的感染或情感的冲击。不能诉诸感性、激发读者想象并从情绪、情感上感染读者的文本,不是文学文本。这也正是我们区分《史记》中“表”、“书”和“列传”、“本

纪”、“世家”以及“列传”、“本纪”、“世家”中不同篇目的文学价值的重要尺度。读学术著作有时也能使人激动,但那是理性的满足或陶醉。鲁迅的杂文是文学而不是一般的思想史著作,也正在于斯。上述道理似乎是老生常谈,可如今有些学者分析文学作品时,恰恰忽略或忘记了这些,他们没有被作品感动,甚至没有认真欣赏品味原著便执笔分析,有的则完全把文学文本当成了思想史研究的资料。文学史上有不少名作并不具有太大的思想史意义。《静夜思》、《渭城曲》一类抒情短章姑且不论,大部头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思想在当时也算不得最先进的思想,写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不会太重视它们。换句话说,它们并不以思想的先进性取胜。外国文学史上也有许多思想并不艰深的名著。马列文论谈及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思想中“落后”乃至“反动”的东西与出色的艺术描写之间的矛盾,往往将其解释为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其实,这也可说明决定他们作品文学价值的主要因素不是作者想要表现的那个“思想”,而是艺术形象本身的感染力。有些经典名著,其蕴涵的思想达到当时最高水平,其观念为时代之最新,甚至具有超前性——超越了当时大多数思想家、哲学家的认识水平,例如莎士比亚既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代表,其作品又表现出对人文主义理想的某种怀疑;鲁迅是“五四”启蒙主义者之一,但其早期思想中又有对民主、科学话语负面效应的清醒认识。莎士比亚剧作、鲁迅小说与杂文至今仍能对我们认识当下的社会人生有参考价值。但是,并非所有文学名著、文学经典都有这么强的对现实的思想启迪价值,对这类作品我们更看重的是其审美愉悦价值与认识价值。也许更多的名著其思想的先进性或超前性只是相对于它那个时代而言,而在今天看来这些也许已成常识或社会共识,我们对它的惊叹正如对一个出土陶罐的惊叹:惊叹的是那个

时代的人居然有这么精巧的工艺,但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却更愿用现今工厂生产的器皿。若论思想先进性,《神曲》一类作品也许还不及今天的一些普通作品。审美愉悦价值是文学价值的前提。在能给读者审美愉悦的前提下,文学名著、文学经典可以使我们了解过去年代或别的国家民族的人如何思、如何想、如何喜、如何怒、如何悲、如何爱和如何死,有什么欲望追求与失落苦恼,还有可能给今天我们如何对待社会人生的根本问题提供借鉴或启发。在能给读者审美愉悦的前提下,文学作品价值的高低才取决于认识、启迪价值方面的“有用”。一个文本如果单有思想的超前性或观念的先进性、现代性,而无审美愉悦性,它也可以成为经典,但那不属于文学经典,而只是哲学经典或学术经典。一个过去时代产生的文本现今如果仍然具有审美愉悦价值和审美认识价值,而其思想对于后世来说已不具有先进性或超前性,它仍不失为文学名著。

过去的主流文学观念将“政治上正确”作为评判作品的核心价值标准,改革开放以后在否定《创业史》等合作化题材小说时,多数论者依据的仍是这一价值观念。而若依此而论,文学史上许多名著都有了问题。其实,文学史上的名著,其政治倾向有时并非后世读者关注的焦点:读者对《三国演义》津津乐道,称颂的往往是赵子龙大战长坂坡、张翼德喝断当阳桥、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诸葛亮舌战群儒等情节,以及上述人物的忠勇或智慧。“关云长单刀赴会”是《三国演义》里的重要情节,读者佩服关公的勇气,但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他“政治上不正确”的系列行动中的一环。曹雪芹“亲满”还是“排满”与《红楼梦》的艺术魅力也没有直接关系。同理,中共党史研究者对“二师学潮”和“高蠡暴动”以及农业合作化运动如何评价,并不影响《红旗谱》对冀中平原的日常生活、柳青对关中农民人伦亲情和创业激情的描写所产生的强烈艺

术感染力。浩然的《艳阳天》是“文革”前完成、“文革”时期走红的长篇小说,孙绍振是新时期前卫文学批评家的代表性人物,他对《艳阳天》的评价值得大家注意:

从纯粹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价值来说,在中国当代农村题材的著名的长篇小说中,《艳阳天》并不被看好,但是从今天的审美历史语境来说,它不但比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秧歌》(张爱玲——英文版)、《三里湾》,而且比之《白鹿原》在艺术成就(审美价值)上要高得多。……排除了“四人帮”的阴谋,审美形象本身的感染力是不可否认的。^①

如果不读孙氏此文,许多人恐怕想不到“三个崛起”之一的孙先生会对被视为“极左”路线产物的《艳阳天》有如此高的评价,而且居然高过了张爱玲的《秧歌》和陈忠实的获奖作品《白鹿原》!加拿大籍华裔学者嘉陵(叶嘉莹)对《艳阳天》的评价同样值得参考:“这部小说充满了一种由热情与理想所凝成的兴发感动的力量,而凡是具有这种品质的作品,都必然可以超越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的环境,而恒久地唤起人们的一种感发和共鸣。”^②她还断言:“浩然的《艳阳天》之可以列入世界伟大小说之林,则是不容置疑的一件事”。^③我认为,虽然大家不一定赞同他们的结论,却有必要对自己评价作品文学价值与文学史地位的尺度予以重新审视。

① 孙绍振:《审美历史语境和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学观念笔谈》,《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

② [加]嘉陵:《〈艳阳天〉重版感言》,《文艺理论与批评》1994年第4期。

③ [加]嘉陵:《我看〈艳阳天〉》,《艳阳天》第一部,华龄出版社1995年版,第62页。